

张锡勤文集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張錫勤文集

第二卷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锡勤文集. 第二卷 / 张锡勤著. —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86-0103-0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7929 号

张锡勤文集·第二卷

ZHANGXIQIN WENJI DI-ER JUAN

张锡勤 著

责任编辑	于 丹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5.25
字 数	558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103-0
定 价	10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锡勤文集》编委会

主 任 丁立群

副主任 罗跃军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立群 王 秋 关健英 孙庆斌 李洪波

张继军 张颖春 罗跃军 周晓莹 柴文华

蒋红雨 雷 震 樊志辉 魏义霞

主 编 柴文华

总序

《张锡勤文集》行将陆续面世,谨遵恩师张锡勤先生生前之命斗胆为之序。

先生 1939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6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黑龙江省哲学会荣誉会长等职,2016 年 4 月 30 日不幸逝世,享年 77 岁。

先生是国家教学名师、中国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

先生做人诚实、宽厚、谦虚,做事勤奋、认真、严谨,是涵养于身、精进于业的人格典范,是兼备德才、含融诗礼(“诗意”指趣味高尚,知道美的欣赏;“礼意”指内有和悦的心情,外有整齐的品节)的儒者,这是每一位熟悉先生的人都有的共同感受。

先生在他的《中国传统道德举要·后记》中把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双知双淑斋”,“双知”即生活上知足、学业德业上知不足,“双淑”即淑身、淑世。可以说,“双知双淑”不仅是先生深刻的生存体悟和理性结晶,也是他塑造自身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代表着纯粹的中国文化,展现出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先生正是以其对“双知双淑”的躬身践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做人、做事的典范。

先生曾说过,教书是为了育人。但育人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事。在这一点上,教师以身作则、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试想,自己不能为人师表,又如何去要求学生?先生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应是教师的座右铭。先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在平淡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缓缓地流淌出来,影响和感动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自己做”,“尽量不去麻烦别人”,“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是先生做事的原则。先生身体孱弱,但从来都拒绝学生帮他拎包,每次入院都不肯惊动别人,在隐瞒不住的情况下,对试图前来探视的学生、同事、领导等也尽量阻拦,不肯因为自己而耽误了他人的学习和工作。而先生自己却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不管什么人去拜访,先生都热情接待,答疑解惑,从不推辞。自1987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生开始,对于这些异地求学的学生们,先生都极尽关心,为了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先生每到元旦,都会把学生们请到家里,自己亲自下厨,做上一桌可口的年夜饭招待大家,师生一起,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这样的场景深深留在了每一位学生的心中。2004年,先生的一位山东籍学生因病住院两月有余,身边没有人照顾,先生承担起了为人师、为人父的责任,医院的伙食条件有限,为了保证营养和口味,先生制定菜谱,并亲自下厨,在家把饭做好,一日三餐,有菜有汤,从未间断,这种对于学生的爱是无私的、真挚的。

先生做人方面的诚实、宽厚、谦虚使他成为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老师、好同事……但先生并不是那种“独善其身”的人,他也常常“兼济天下”。先生曾经说过,人民用血汗养育了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他担任过哲学系主任,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学术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等职,并多次参加过不同层次的评定职称和评奖工作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勤勤恳恳地为社会尽自己的义务。

先生在平凡的工作中彰显着伟大的情怀,在朴素的生活中体现出崇高的风骨,得到了人们的爱戴和社会的肯定,2001年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被评为龙江道德模范人物,2008年被授予龙江文化建设终身成就奖。

先生 20 世纪 60 年代初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生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分别开设过“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专题”“中国近代哲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与文化”“中国传统道德范畴”等课程,共培养博士生 30 余人、硕士生 20 余人,还有不计其数的本科生。

先生的基本教育理念是“不误人子弟”。先生从小就听过父辈讲的一个故事,并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从前有个庸医,总是乱给病人开药方,因此害死了很多人。庸医死后被打入第十八层地狱,庸医因此愤愤不平,却听到脚下还有声音,庸医疑惑怎么还会有第十九层地狱,一问才知道打到第十九层地狱的是误人子弟的教师。足见,误人子弟的教师比害死人的庸医还要坏,受到的惩罚更为严厉。先生常说:“木匠做桌椅做坏了可以重做,但教师把人教坏了就是一辈子的事了。”先生认为,要做到不误人子弟,关键要很好地练“内功”,教师自己“不像样”,很难让学生“像样”,要想圆满地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自己必须有丰厚的学问积累。先生把这种理念贯彻到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博览群书,深研专业,认真备课,循序引导,生动讲授,耐心解答,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先生很重视教材建设和教学研究。1988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书荣获黑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于 1992 年出了台湾版,先后被华东师范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和台南师范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采用为本科教材。2004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一书被教育部确定为“2004—2005 年度全国研究生推荐教材”。2009 年至 2014 年,先生作为首席专家,带领来自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组成的团队,承担并顺利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专项项目“中国伦理思想史”,2015 年 2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全国高校提供了一部高质量、规范化的优秀教材。

在教学研究方面,先生的项目“教学·科研·育人相结合,促进教学质量提高”1989年荣获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另一项目“多渠道培养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1991年又荣获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表明先生在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此外,先生是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带头人,为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先生的带领下,学科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后,2009年以中国哲学学科为核心力量的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获批为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先生一直重视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的建设。由先生作为主持人的《中国哲学史》课程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由先生作为负责人的中国哲学教学团队于2009年获批为国家级核心课程教学团队;由先生作为带头人的中国哲学研究生团队于2009年获黑龙江省优秀研究生指导团队。

正因为先生长期在教学一线辛勤耕耘,成绩突出,所以获得了许多荣誉。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8年被评为全国教学名师,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表明先生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实至名归的名师。

三

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其成果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以《中国近代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以下简称《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为代表;第二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专题研究,以《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以下简称《革命》)、《戊戌思潮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下简称《命运》)为代表;第三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个案研究,以《梁启超思想平议》(以下简称《平议》)为代表。

(一)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

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可以概括为“三部曲”:第一是起步

阶段,以1980年出版的《简史》为代表;第二是成熟阶段,以1988年出版的《史》为代表;第三是巅峰阶段,以2004年出版的《史稿》为代表。

1.《简史》

《简史》虽然是字数不足20万的小册子,但却是先生著作类的处女作。之所以把这部书称作先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的一个环节,是因为它在先生整个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1)确立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大致发展阶段,即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

(2)确立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即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等。

(3)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评价尺度,即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尽管先生后来的研究成果在内容上大大拓展了,但在阶段划分、人物筛选、理论立场方面与《简史》大体一致。

2.《史》

之所以把《史》称作先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主要原因一是这部书体系更为完整,内容更为丰富,二是先生在这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观。

《史》约43万字,与《简史》相比有较大的拓展和细化。

(1)从总的框架来看,增加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顽固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一章,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一节扩展为一章。

(2)从新增加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汪士铎的思想、洋务派的思想、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唐才常的思想、诗界革命、史界革命、道德革命、邹容的思想、陈天华的思想、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蔡元培的思想、宋教仁的思想、朱执信的思想等。

(3)从原有人物和内容来看,都或多或少有所细化。如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等。

先生在《史》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观,这是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所总结出来的理论结晶。

(1)“主题说”

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

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使人民摆脱苦难”^①。这一概括符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实际,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和中华振兴这个主题去思考问题的。

(2)“寻路说”

其认为谈“变”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共同话题,但由于阶级、阶层、派别的不同,人们对“病症”的诊断、“药方”的内容、蓝图的绘制是不同的,因此,“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形象一点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先辈们寻找中国前途出路的‘寻路记’”^②。这个寻路历程大体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六个历史阶段,相应地出现了六种不同的社会思潮。民族危机和民族文化的危机凸显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疑问,尽管各家各派提出的方案不同,但都是在探寻民族解放和中华振兴的路径,所以先生“寻路记”的说法既准确恰当,又生动形象。

(3)“斗争说”

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尖锐复杂,充满了变与不变的争论:“‘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之争,革新与守旧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体用本末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科学与迷信之争,对外抵抗与对外妥协之争,‘以农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新道德与旧道德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新史学与旧史学之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③既然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派别,其间的争辩是难以避免的,先生对各种争论的概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较为全面。

(4)“西学东渐说”

其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西学东渐”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具有浓郁的爱国情怀。中华文化曾是代表农业文明的先进文化,所以在历史上总是同化异族文化,没有遭遇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② 同上。

③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到真正的危机。但当一种文化碰到另一种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时,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近代文化以后,其落后性就凸显出来,被西方文化碰得落花流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走上了由被迫到自觉学习西方文化的道路。先生认为这种学习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确是不可不刊之论。

(5)“三阶段说”

其认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物”的方面学习西方,主要是工艺技术、军火武器制造等,以洋务派为代表;二是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等,以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代表;三是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以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代表。“三阶段说”发轫于梁启超,先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6)“反省说”

其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用两点论看待西方文化,在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也不断反省西方文化,既看到其优长,也指出其缺陷,从而探寻一种中西融合的可能道路。先生所说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事实,除了激进主义西化派即全盘西化论者有意回避西方近代文化的短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能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这是理智和清醒的表现。

(7)“三次觉醒说”

其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苦难的中国人不断觉醒的历史”^①。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革,这是第一次觉醒;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弊端,并试图对之进行改良,使其进一步完善,这是第二次觉醒;然而,前两次觉醒所实施的方案均以失败告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②,这是第三次觉醒,而且是“近代中国人新的、更伟大的觉醒”^③。这种观点是对国人觉醒历程的动态描述,体现了不断追求真理的自觉性。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8)“启蒙和思想解放说”

认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近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化时代,是一个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地位十分重要”^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哲学变革、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史界革命、圣贤革命等思潮,其中最突出的是哲学变革。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引进、吸收西方的某些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成果,一方面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古代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但又是一种新旧中西杂凑的,并非完全是近代的,也非完全是西式的。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是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提供理论支撑的,具有浓郁的现实感,这是它的优点,但同时也带来了粗浅、杂乱、不成体系的缺点。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主观唯心论色彩比较突出,大都夸大了“心力”的作用。与哲学变革相同步的还有道德革命,即反对中国传统道德,提倡西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道德理念,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道德革命不论在破旧方面还是在立新方面都是不彻底的。中国有着自身的启蒙思想史,明清之际出现了内生的早期启蒙思潮,表现出初步的批判意识、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而近代则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更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先生所说的各种变革、革命即是思想启蒙的具体表现。

3.《史稿》

《史稿》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也是先生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先生不仅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观有所补充和发展,并丰富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观。

(1)增加的新内容

诚如先生在此书《后记》中所说,《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成的。原书为33节,现扩为53节,字数则由原来的40余万扩为近80万。

具体来讲,增加的新内容主要包括:包世臣、姚莹等人的思想,《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介绍,郭嵩焘的思想,冯桂芬的思想,王韬的思想,薛福成、马建忠的思想,郑观应的思想,陈炽的思想,各种“出使日记”、游记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介绍,《万国公报》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其对西学的传播,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西学中源”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麦孟华的思想,宋恕的思想,何启、胡礼垣的思想,戊戌时期的文化革新,革命派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文化革新的继续,革命派中的国粹主义,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争论,新文化运动对戊戌、辛亥时期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继承与超越,批判、创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民主观,科学观,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等等。从增加的新内容来看,其重点是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革命。新内容的增加,使得《史稿》一书的内容格外厚重。

(2) 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观的补充发展

A. 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面貌的描述

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一时期,不仅各色西方学说思想广泛流行,而且沉寂多年的先秦诸子学、今文经学、佛学、陆王心学以及明清之际诸大家的学说也盛极一时,先后复兴。可以说是中西交汇,古今交错,异彩纷呈,思潮迭起,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① 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面貌的描述是符合实际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堪与先秦和现代(1919—1949)的“百家争鸣”相媲美。

B. 学习西方的“三阶段说”是相对的

对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梁启超的看法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应当指出的是,“三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是就主流而言的,我们对此不能做机械的分割。事实上,“三阶段”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的。在第一阶段,从魏源、徐继畲直到洋务派的某些成员,已经注意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并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向往之情。在第二阶段,严复、梁启超等人已经开始介绍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关注其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而此阶段仍然继续从物质层面学习西方。在第三阶段,仍然继续从物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原因在于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它的影响也是整体性的,中国人对它的认识不可能是单一的。^② 先生对“三阶段”关系的看法是深刻的,体现了普遍联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基本原则。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C. 转型概念的引入

新世纪前后,先生吸收了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引入了转型的说法。先生指出,自强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基本出发点。所谓自强,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由弱变强,它是中华民族渡过难关的精神支柱。鸦片战争以后,自强是诸多政治派别的共同口号。要自强,必须变革。而变革不应是枝枝节节的“小变”,而应是全盘的“大变”。所谓“大变”“全变”就是实现社会转型,即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维新派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注意到,在社会转型即近代化的过程中,人的近代化至关重要。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代“新民”,即近代化的新人,便不可能真正实现近代化。由此,他们又提出了提高全民素质、改造国民性的任务。^①先生所说的转型与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的,经济、政治、社会、人的现代化都内含其中。

D. 对哲学变革的细化

先生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四个重要方面:一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它使中国知识分子增长了新知,扩大了视野,认识产生了飞跃。它为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提供了科学基础,使中国哲学的物质观、天道观、变易观、认识论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它养成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并了解了科学方法。二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对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影响更为重要、直接。它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的思想资料和思维方式、新的哲学意识和观念以及新的哲学范畴、名词概念。这就为近代中国的哲学变革提供了武器和借鉴,给中国哲学输入了新的成分,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②三是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对中国传统哲学做清理改造、批判继承是近代哲学变革的中心一环。四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变革。这一变革是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型的重要标志。其具体表现在新的范畴、概念的引进,以新的范畴、概念取代旧的,对旧范畴进行改造、充实,赋予新义等。^③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论述已见于《史》,这里谈得更为明晰和具体。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②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③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E. 对批判与革新、创新的强调

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时代,因此批判与革新、创新自然成了中国近代的时代精神。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在近代被激活是时代的需要,同时它又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近代化进程的动力。“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给人以深刻印象和强烈震撼的正是这种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自觉的批判意识与革新、创新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它是社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①批判与革新、创新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戊戌维新之后,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被明显激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被高度弘扬,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家所从事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他们把一切都推向理性的审判台。这种批判的彻底性势必使革新、开新、创新精神进一步张扬、深化。经过几代人的呼吁提倡,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社会变革、文化革新的实践,批判、创新逐渐成为时代精神,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说到启蒙,过去人们往往只看到自由、平等、博爱、民权、民主观念的宣传、灌输,其实更根本的应是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的激活和自主理性的建立。“正是这一精神的激活,长期存在于国人中的无比巨大的历史惰性才遭到猛烈冲击,古老的中国才再也无法继续维持那僵滞的旧秩序。由此,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亦即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②但在批判与革新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颇。这是先生对中国近代精神新的概括,突出了批判和创新的重要价值。

(3) 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史观

1992年,先生著有《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一书,在这部书中,先生初步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史观的一些观点。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做“革故更新”的变革,是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③这场运动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也是出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中国近代的文化革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②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③ 张锡勤:《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命是近代的一批有识之士为了挽救文化危机,进而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文化重建运动,是为了向新的世纪过渡而在文化上所做的自我调整。它是中国向近代化、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这场文化革命和文化重建,从本质上说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是一次学习西方、大规模地输入西方近代文化的文化输入运动,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不论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

在《史稿》中,先生丰富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观。

A. 文化转型的原因

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代是一个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时代。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文化结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学、新文化。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因为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它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猛烈冲击,使之面临严重挑战。与日俱增的文化危机势必要刺激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引发文化革新的要求。但是,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与转型,归根到底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和反映。^① 先生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原因的探讨体现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思路,这在《革命》一书中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B. 文化转型的过程

先生指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是逐步深入的。大致说来,在戊戌维新之前,改革者们主要是接受西方文化,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面做触动。^② 先生辩证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两个命题: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生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是要让人们摆正两者的关系,不致因采西学而损害中学的主导地位。不过,既然承认西学有用,并以之“为用”,这就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西学的合法地位,也就是认为面对新的历史环境,中学需要西学做补充,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学在新形势下已显露了它的不足。这些又有利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于接纳西学和文化革新。^①二是“西学中源”。先生指出,“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源于中学,是中学在西方的流传和发展。因此,今天“采西学”乃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光复旧物。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文化观固然是抬高中学、贬低西学,旨在维护本土文化的地位、尊严,但它又起到了消解中学与西学内在紧张的作用。“它既将西学等同于中国的古学,视之为中国古学的发展,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人们接受西学。”^②真正意义的文化批判与重建,严格说来是始于戊戌。因为戊戌维新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转型,它自然要引发文化转型。在戊戌时期,一批维新派思想家开始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面。而随着戊戌思潮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进一步深化,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又公开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口号,明确主张清理、批判旧文化以建立新文化。戊戌时期一些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明显表现出与传统儒学的决裂,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先生以戊戌维新为界,以对待旧学批判程度为参照,勾勒了中国近代文化革新或转型的历程,其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中源”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

C.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先生指出,在文化革新方面,存在着激进主义昂扬的现象。这里的激进主义主要指文化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在文化革新中激情压倒理性。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发源于谭嗣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文化激进主义有它的合理性,它曾使文化革新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决的气势,进行得相当彻底,从而使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遭到巨大、猛烈的冲击。但它同时也滋生了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这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无疑会带来不良影响。与文化激进主义相对应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一概排拒西学,但他们又对那时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心醉欧风”的倾向心存忧虑,担心日盛一日的“欧风美雨”危及中国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出现鸠占鹊巢的局面。他们主张在维护中国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吸取、接受西学。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维护,也不是原封不动的,不做任何触动、改造的。他们也程度不同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某些陈腐、落后、不合时代精神与需要的东西,

①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②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